

金華集



杨应彬 郑黎亚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金华集

杨应彬 郑黎亚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粤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卢 权

封面设计：杨白子

金 华 集

杨应彬 郑黎亚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印刷厂印刷

厂址：广州市环市东路 475 号印刷厂

787×1092 毫米大 32 开本 20 印张 340,000 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218-02015-1/K·425

定价 3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编 者 的 话

杨应彬、郑黎亚同志为了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他们于浙江金华相识后共同战斗 57 周年，共同生活 50 周年，以及杨应彬同志参加革命 60 周年，特出版这本《金华集》，并以两朵金花献给党和培养他们成长的老领导、老同志。蒙作者的信赖和委托，编者协助做了一些具体的编辑出版工作，借此说明几点：

一、本书选进了杨应彬、郑黎亚同志各个时期的部分著作和他们的儿辈们的文章，正文前面还刊登了他们的一批照片。本书可谓图文并茂，富有特色。各个时期的文章未作改动，以保持真实。

二、杨应彬同志是一位才华横溢、德高望重、深受人们尊敬的革命前辈，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高足。他自幼勤奋好学，工作之余写了许多造诣很深的文章和诗词，已出版的有《岭南春》、《春草集》、《东湖诗草》、《东山浅唱》、《碎砖集》和《杨应彬作品选萃》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未满 13 岁时便已撰写了《小先生的游记》一书，由陶行知先生题写书名于 1935 年在上海出版，曾先后再版过十二次，引起了轰动。由于文中学习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当时社会状况进行剖析，后来竟被国民党当

局列为禁书，禁止继续出版。解放后此书未曾再版，现收进本书以飨读者。书内还收进了杨应彬同志一篇长达 12 万字的回忆录。这是今年由他口述，郑黎亚同志记录协助整理而成的。该文忠实地叙述了他走过的 60 年光辉而曲折的革命历程，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各个时期的斗争历史及经验教训，是一份难得的党史参考资料。郑黎亚同志亦是一位参加革命 57 年的老同志，解放前长期从事党的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解放后在中共广州市委机关、党校等单位从事党务和理论教育工作。她一贯关心党的建设和青少年的成长；离休以后还经常向干部和青少年讲革命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她在日常工作中也写了不少文章和回忆录，已结集成《我走过的路》一书出版。本书只收入她的部分文章。

三、杨应彬、郑黎亚同志不仅是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战友，而且是一对恩爱夫妻；以他们为核心组建起来的家庭更是一个模范家庭。他们对长期一起生活的父母、姐姐等人，十分尊重孝敬，关怀备至；对晚辈则关心爱护，循循善诱。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儿子、儿媳及孙儿们和睦相处，尊敬长辈，因而形成了尊老爱幼、互谅互助、勤俭朴素、和睦共处的好家风。在他们金婚的时候，儿子、媳妇们分别撰写文章歌颂其美德，以兹纪念。本书的出版经费亦是由作者的儿子、儿媳们全部负责，他们都为本书的出版作出了贡献。

四、在编辑出版本书的过程中，除了得到作者的指导和家人的积极配合外，还得到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军区

空军政治部印刷厂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杨白子同志为本书设计了很好的封面，对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胡提春 1995 年 8 月

目 录

杨应彬著作

六十年的战斗历程（回忆录）	（1）
一、从小就卷入革命的洪流之中	（1）
二、在山海工学团期间难忘的几件事	（8）
三、到抗日前线去	（14）
四、南路岁月	（73）
五、解放初期到“四清”运动	（93）
六、十年浩劫期间	（132）
七、迎接新时期的到来	（151）
小先生的游记	（214）
崩溃中的大埔农村	（257）
战地儿童工作的困难与解决的方法	（261）
给陶行知先生的一封信	（270）
毛泽东的革命军事思想	（271）
论渡江	（281）
反对游击主义，向正规化提高	（288）
高度发挥群众的积极性	（295）
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	（302）
紧张战斗的一周间	（313）
文学要努力反映改革的形势	（323）

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330)
关于商品经济理论的探讨	(341)
陶行知教育思想浅识	(350)
在广东黄埔军校同学会一届五次 理事会上的讲话	(362)
商品经济与民主	(368)
纪念张九龄	(370)
纪念雷沛鸿先生	(376)
在南粤听到了新中国的礼炮声	(383)
诗词创作要合时代精神	(385)
简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389)
往事悠悠五十年	(398)
秋光赞	(401)
山区要建设充分发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402)
怀念我的三位老师	(409)
掌握健康，掌握命运	(418)
壮烈的悲凉	(421)
1945年8月15日我在南宁	(426)
歌曲诗词	(429)

郑黎亚著作

献给党七十诞辰的礼物

——回忆我走过的路	(459)
-----------------	-------

赞娘家

- 祝贺广州市妇联成立四十周年 (483)
- 论老年学校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487)
- 老年当作青年过 (492)
- 我爱我的家 (497)
- 回忆党对我进行理想和纪律教育
-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一些体会
- （在市委党校青训班上的讲话稿） (501)
- 我更加热爱广州
- 读《中共广州地方史》后 (515)
- 学习少林内劲一指禅功的体会 (524)

儿辈们之作

- 家教 杨小斌 (529)
- 于细微处见真情 杨小青 (532)
- 可喜可贺，可颂可歌 杨小村 许朝平 (534)
- 我的爸爸妈妈 杨小杨 (537)
- 我的家公家婆 许 绮 (544)

六十年的战斗历程

(回忆录)

今年—199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 50 周年，是抗日战争胜利的 50 周年，是中国红军到达陕北的 60 周年。在这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也想起今年是我参加革命的 60 周年，和黎亚共同战斗的 57 年，婚后共同生活的 50 周年。过去彼此忙于战斗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回顾往事。现在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回顾一下过去是很有意思的。60 年在人类长河中是一瞬间，对个人说来则是漫长的岁月。我们经历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尽管是沧海之一粟，但也是这个大海中的一滴水，可以看到时代的光辉。出于这种动机，就由我慢慢回忆，由黎亚记录下来，成了这篇回忆录。

一、从小就卷入革命洪流之中

每一个参加革命的人，都有着他参加革命的必然原因，但是他如何同革命队伍发生关系的，却常常通过许多偶然的机遇。1935 年 9 月我第二次去上海，住在静安寺路赫德路口陶行知先生住处。当时认识了一位同志叫做王东方，他比我只大三四岁。我们一见如故，很快就熟悉了。

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话，从家庭出身谈到世界大势，从理论学习谈到革命斗争。当年10月的一天晚上东方同志在我住地借宿，两个人抵足而眠，又谈到半夜。第二天一早，他走了。我却在枕头底下发现几本油印得非常精美的小册子。封面上显眼地印着红色的锤子与镰刀的徽记。里面的字每一笔只有头发丝粗，每一个只有绿豆般大，可是一行行、一个个都十分秀丽，雪白的纸上没有半点墨污。哎呀！这是秘密文件呀！我该不该看呢？迟疑了一下，我还是看了。里面说的全是有关参加组织的问题，我一口气读完了它。又是兴奋，又是像偷偷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那样感到自疚。晚上东方同志又来了，却装着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那样平静，他显然在等待着我先讲话。我一鼓作气把两种心情同时告诉他。向他认错，因为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就看了文件；又向他提出要求，我要参加组织。他满意地笑了说：“文件是特意留给你看的。参加组织，我们热烈欢迎。”就这样，我参加了左翼教联（当时叫“新兴教育工作者联盟”）。这是党的外围组织，是秘密的群众组织，主要吸收学校里进步师生参加。

我参加左翼教联后，被分配到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山海工学团工作。这是一所革命学校，是党在农村进行革命活动的阵地。团长是张劲夫同志，是地下党员。“左翼教联”、“中青”都有很多人在这里工作。先后有林一心、王东方、张健、侣朋、许鲁家（鲁藜）、张家榭、刘水居、龚士其、杨一德、张恒、胡晓峰、张轨、戴季康、吴立奇、周瑞锦、陈光宇等人。工作对象一部分是农友，一部分是

农村里的失学儿童。我主要负责儿童工作，给他们上政治课、识字课、教唱歌等。我们是半工半读性质的，经费主要靠陶行知先生募捐得来。工学团经常请一些社会上的知名人士来演讲，如钱亦石、邹韬奋、钱俊瑞、薛暮桥等人。冼星海也常来教唱歌。

1936年春的一天，东方同志给我传达：“目前形势有变化，需要团结发动更多的人进行救亡图存的工作，左翼教联这个组织形式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自动解散，参加教联的有一部分人将吸收入党。”东方说，我是被吸收入党的，要我写一份自传。我听后内心非常兴奋和激动，当晚就在一个小阁楼上，点着油灯写好了。第二天交给东方。不久东方同志告诉我：“批准了。”这种欢乐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因为在我心目中共产党员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难忘的1936年6月19日，就是这一天，我进行了入党誓宣仪式。介绍我入党的是王洞若和王东方，那天没有来。上级党组织派张敬人同志来监督（后来我才知道，张是教联党团书记）。和我一起宣誓的还有许鲁家、张家械同志。我们四个人在山海附近的石角坟村，我和许鲁家住的一间小房子里向党宣誓。当时不可能挂红旗，但是我们必须有红旗。张敬人同志熟练地在一张红色的香烟纸上画上一面旗子，旗上写着C. P. C. 并且解释说C. P. C 是中国共产党的意思。我们就对着这面红旗宣誓了。当时已经是“一二·九”以后，抗日救亡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但是敌人对革命运动的镇压仍然无所不用其极。为了防止

意外，宣誓完毕，我们就将画在低上的红旗烧掉了。但是红旗却永远在我的心头生根了。党的思想上的红旗永远引导着我们前进。

小小年纪参加革命队伍，这在红军中是不足为奇的。在红军里有不少红小鬼，普遍的原因是家里穷，受革命影响早。回想我自己也有同样的境遇。

我是广东大埔百侯南乡人。1921年10月20日出生。母亲生我的时候已是第三胎了。第二胎没有养活，是害了破伤风死的。当我还在月子里，又得了“锁子鬼”，（破伤风）牙关紧闭，奄奄一息。母亲流着眼泪准备把我丢在畚箕里，但又舍不得，重又抱起来，希望能把我救活。旧社会说，我命大。真的，在母亲的怀抱里又活起来了。

那时母亲是靠挑担过日子的，一天不挑就没有钱买米下锅。父亲做小买卖，赚不到什么钱。母亲是在她出世三个月的时候卖到杨家当童养媳的。祖父死得很早，祖母养不活一家，就改嫁了。父母就靠着嫁祖母的钱与曾祖母相依为命过日子。谁知当我的大姐才五岁时，曾祖母又因贫病交迫上吊死了。没有钱埋葬，只好卖了大姐来埋葬她。这种凄凉的日子母亲讲起来都要流眼泪。母亲很爱我，小时候背在她背上，给我唱儿歌，给我讲故事，讲些穷人受苦受难的故事。因此在我小小的心灵里，就深深刻下了穷人受苦的烙印。

当我七八岁刚懂事的时候，大约1929年夏，活动在闽粤赣边的一支红军地方主力挺进到我的家乡，使我大开眼界，懂得了不少新鲜东西。有一天早晨，不知道为什

么我起得特别早。朝雾刚刚散去，远山苍翠欲滴，乡村分外安谧，这是一场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宁静。因为残余的白军逃过河去了，红军还没有进村。一会儿，一轮红日从东山顶上冉冉上升，霞光万道，立即照红了半边天。就在这个时候，一枝红旗在日边渐渐升起，先见矛头，再见大旗，最后一小队人马从山背后登上山顶。“来啦！”全村沸腾起一阵欢呼，红军进村了。

红军进村后可热闹极了，他们做了许多大事，我当时理解不了，但是我学会了几首山歌，跟着大伙儿唱：“日头一出满天光，穷人都爱共产党”；认识了写在门口祠堂墙壁上一个字就有一人多高的大标语：“国民党就是刮民**猴**”，“没收土豪田地分配给贫民”；还从一些积极分子口中听到很中听的两句：“太阳瓦面过，富贵轮流做”。过了三天，红军处决了当地反动民团的团董和几个反革命份子，开拔了。但这支红军，这面红旗，这些山歌，这些标语，这些热烈的斗争场面却永远在我心头留下来了，埋下了后来参加革命的种子。

家穷，红军的影响，这都是在儿童时期受的社会教育，而较系统较深刻的教育，应该说是在百侯中学学习的那段时期。但小学毕业后，升中学谈何容易，我妈妈准备送我去学裁缝。恰好这时陶行知先生派了一批进步老师来复办百侯中学。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杨焕楣（杨震同志）报了名，他和我很要好，三番四次到我家来，动员我去报名。正好那时妈妈挑担到高陂去了，我便把自己养的四只小鸡卖了1元2角，拿1元钱去报了名。妈妈回来后知道

这件事，流着眼泪说：“你投错了胎，怎么出生在穷人家里呀！”后来妈妈卖了一头小猪，借了钱让我读了半年。以后，学校知道此事，让我们几个穷学生免交学费，老师还捐钱买书送给我们，我们又勤工俭学，为学校挑水，干点杂活，赚点钱买点文具。就这样我读到初中三上学期。真是艰难呀！

但我很幸运，我们的老师很好，特别是班主任程今吾老师（文革前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不但给我们传授文化知识，还采用启发式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他把鲁迅的《野草》高尔基的《海燕》等进步书文选作补充读物，还介绍我们看进步书籍如《毁灭》《铁流》《资本论大纲》《唯物辩证法入门》等。一时间我们这班初中生都争先阅读这些大部头的书，形成浓厚的学习风气，眼界大大开阔了。学校还鼓励学生进行课外活动，晚上办夜校，给成人扫盲。提倡讲普通话，举行演讲比赛。出墙报，记日记，演话剧。我和杨焕楣还一起演了一出《凤阳花鼓》。我们那个班有40多人。到现在还有来往的有：杨焕楣、刘兆伦、杨培新、杨治明、杨旋、杨启元、杨淑珍、肖练石，还有不同班的张力克、张伟烈、肖施培、杨琴、杨萍、杨维黑等。六十多年了，真不容易呀！他们现在都已离休。过去几十年在党的领导下，在各条战线上都做出了贡献。

1934年暑假，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跟一位老师去了上海。当时我只穿一件背心，一条裤衩，带了一支自来水笔和几十张过期的日历纸（准备写日记用的），打赤脚走了

50里山路到高陂，然后经潮州、汕头到了上海。在汕头到上海的船上遇到台风。差点喂了海鱼。这次去上海真是大开眼界，对上海的殖民地租界的本质有了粗浅的了解，在日记里流露了自己强烈的愤慨和不满。更幸运的是我认识了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他知道这个情况后，要我把这些日记拿到儿童书局去出版，取名《小先生的游记》，还为这本书题了封面。我自己根本没有想到不满13周岁的少年居然出了一本书，解放前再版了12次，因为里面提到阶级对立，还一度被国民党列为禁书。

这次去上海，还认识了王洞若老师，可以说他是我入党的启蒙人。那年的“八·一”，上海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第二天王洞若老师把我找去，给我看传单并和我谈了话。传单的内容主要是：反蒋、反内战、反阶级压迫和剥削的，这和我贫苦的出身和侯中所受的教育紧密结合着，所以很容易接受，很受鼓舞。第二年很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次谈话和传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由于这次去上海受到启发和教育，回到家乡后便呆不住了，总想到外面去追求进步，寻找革命。1935年春天，程今吾老师从南宁来信说，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正筹办师范班，可以到那里免费学习。我们听了非常高兴。我就和张力克、肖练石、杨启元、杨楚妙、杨北京、肖文、杨明通结伴去广西南宁当工读生。我们历时半个月行程二千多华里，才到达南宁，学习后派去青山林场，一边育苗种树，一边自己学习。工资每月5块小洋，我伙食用了3块，剩下2块寄回家去。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半年后，我

又去了上海，并在上海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党。当时年龄虽小，但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些准备，组织上便吸收了。入党时还不满 15 岁，也没有后补期。

二、在山海工学团期间难忘的几件事

（一）探索一套教学方法

我在山海工学团一开始任小先生，后任总团儿童部负责人。日常工作就是给儿童们上课。总团儿童班的学生，主要来自夏家宅等农村的孩子，几十个人却是从三年班到六年班都有，很难分班，也很难分科。当时第一位的任务是宣传抗日救亡，要把政治、文化等结合起来，于是我们就想自己编课本，综合施教。我想了个办法：把一张白报纸分成四开，上面贴些图片，这些图片大多是从进步报刊上剪下来的照片、漫画或地图，再配上诗歌或救亡歌曲，内容都是唤醒人们起来抗日救国的，小孩子很有兴趣，比如有一张图片是讲华北草原上的小孩与一条狗在玩耍的。我编了一首儿歌写在图边说：“你看华北小朋友，玩得多自由，如果当了亡国奴，不如身边那只狗”。孩子们一面看图，一面识字。识了字又教他们唱歌，很高兴。这样学习，进步很快。王洞若老师有一次到学校来，看到这种教学方法，很赞赏。

（二）我在党小组生活中受到的教育

我在山海工学团期间的组织生活是很健全的。和我